

与书同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协办

我的变与不变

○ 陕西人民出版社　屈　奇

这是我在办公室度过的最后一个周末。看着地上整齐码放的纸箱，我仿佛在检视自己三十八年来流逝的岁月——每一箱都像一卷编年史，尘封着一段无法追回的过往。

趴在窗口，点燃一支香烟，白色的烟雾迅速随风而逝。天上依旧是白云朵朵，地上依旧是熙熙攘攘。一样的风景，我已看了三十八年。然而，无论是自己还是时代，都已完成了堪称天翻地覆的蜕变。

1986 年，我二十出头，一路蹦跳着走过一二百级台阶，走进这窗明几净的编辑室。接待我的主任姓王，我怯怯地叫了声“老师好”，几个“眼镜”同时从桌面上转过来，报以微笑。其中两位年纪较大，伛偻着背，头埋在如山一样的稿件里。没多久，他们就退休了，但那背影却刻进了我的记忆中，给我的青春投下第一道阴影——让我看到了那时极不想看到的人生“前景”。

毕业纪念册上，我的同学得知我被分到出版社，并且要和古籍打交道，就写了这样一句话：别人是一斧头一斧头开辟未来，你却一镘头一镘头挖向过去。

其实我报到的不是古籍编辑部，而是辞书译文编辑室。当时他们准备出版一套大型辞书《十三经辞典》，缺人，系里的老师就推荐了我。于是，我就成了一名辞书编辑，真的开启了“一镘头一镘头挖向过去”的生涯。

给我分配的第一项工作是“打号”。那时的稿子都是手写的，一部上百万字的书稿堆起来比人还高，需要用打号机一页一页打码，一天下来，我的手掌就磨出了一个大大的水泡。

编辑语言类辞书最让人头大的不是翻字典、查释义，而是核对词条下所引的例句。那时没有网络，你觉得读起来不顺当，就要查原书。每编发一部稿子，都要被逼着读许多书。十三经、先秦诸子、《史记》《汉书》等，这些常被引用的典籍，我上学时并没有认真细读，这时连本带利补上，几乎一个字一个字地查。最沮丧的是，有时读完全篇也没找到要核对的那个句子。于是不得不问作者，然后等待作者查证，最后可能只得到一句轻描淡写的“抱歉！不小心注错了”。

我参与编辑的最大最重要的辞书自然是 3000 多万字的《十三经辞典》。这部大书，从 1984 年酝酿，到 1988 年列入国家辞书编写出版规划，再到 2012 年全部出版齐全，历时 28 年。这是大陆第一部引进计算机参与编纂的辞书，其中的字词索引全部由计算机提取。计算机和相关软件系统还是由台湾省某学术机构提供的。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这是相当前沿且不可思议的事。也正是从那时起，辞书编纂的生态，被技术革命悄然改变。传统意义上依靠纸笔、卡片和人工校勘进行编纂的方式，逐渐被高效、精准的数字化处理替代，新技术不仅大幅提升了编纂效率，而且从本质上重塑了辞书的形态与编辑流程。

计算机时代的到来，加速了传统纸质辞书的式微。技术带来的不仅是工具的革命，还是一场深刻的方法论与行业生态的转型。尤其是搜索引擎的普及，彻底重塑了公众的信息检索习惯。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指出，遇到问题时，人们的第一反应不再是翻阅纸质辞书，而是打开搜索引擎。这种“即问即得”的便捷、免费和看似无限的信息量，让耗时数年数月编纂、出版，还需付费购买的权威辞书，在普通用户的日常生活中被迅速边缘化。

跨入新世纪，我基本不用再翻阅典籍寻章摘句，凡事问百度，在体验着新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巨大的危机感也随之而来。在此前的编辑生涯中，我已亲身经历了从“铅火时代”到“键盘时代”的转变，见证了无数人的痛苦转型。而作为一名辞书编辑，不免心有戚戚。我将如何面对？

2000 年，社里收购了两家报纸；一年后，我做出了职业生涯中最冒险也最艰难的抉择——加入那家刚刚完成转型的报社。从“一镘头一镘头挖向过去”，骤然转变为追逐“正在发生的历史”，这无异于一次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一切必须从零开始。

幸运的是，在这里，我结识了一群才华横溢的记者，他们中的几个人后来成为我信赖的作者。此外，在报业市场的惊涛骇浪中，我对市场经济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开始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我曾经的职业。因此，2006 年当我重返编辑岗位时，我不再是那个只在给定的圈子里打转转的老“雕虫”，我带回了新闻人对时代脉搏的敏锐触觉，以及在市场竞争中磨砺出的生存智慧。当我将这些“鲜活的血液”注入编辑工作中时，一切都改变了。

我选择了刚刚兴起的主题出版这一条赛道。

第一本图书是《十一维空间——物理学家侯伯宇的多维人生》（以下简称《十一维空间》）。

侯伯宇是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也是一位享誉国内外的著名物理学家。他一生奋战在理论物理科学研究的世界前沿，曾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阿卜杜勒·萨拉姆等诸多国际著名物理学家密切合作，其研究成果被国际理论物理学界命名为“侯氏理论”。

2012 年，就在侯伯宇先生被确定为重大先进典型的同时，我开始了这部书的策划。

我与选定的作者赵韦商定，这部书要跳出以往“报告文学”的窠臼。不仅要关注传主的人生阅历、事迹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四维空间”，还应将目光投向传主的内心世界——那“卷曲着的十一维空间”（“十一维空间”恰好是侯伯宇先生研究的领域）；表达形式应该是全新的，应该大胆学习借鉴国外非虚构作品，尝试“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感谢赵韦，他以深入扎实的采访和非凡的表达，出色地完成了这部作品。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星把阅读《十一维空间》的过程称为一次“强烈而激动人心的阅读体验”，并在为该书所写的评论《一部不同凡响的科学家传记》中写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十一维空间》不仅是陕西传记文学，而且是全国传记文学，特别是理论科学家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在全国人民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历史新阶段，《十一维空间》的出版更加具有意义和价值。”

《十一维空间》出版后，当年即获得“陕西省 2013 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此外，还获得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资金奖励，并且先后印行三次，累计印数达到 12000 多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有了这次良好开端，我又和部门同志先后策划了“考古陕西系列丛书”、《中国动力》《国家至上》《2020，白浪村的中国梦》等非虚构项目。这些项目立足陕西，聚焦陕西改革创新的火热实践，由于在选题方向和表达形式等方面的创新，出版后均获得较大社会反响。其中，《国家至上》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考古陕西》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动力》获得国资委“五个一工程”奖，并入围“中国好书”榜单。它们的出版为宣传陕西、展示陕西生动立体的形象，作出了各自应有的贡献。

感谢时代！我的职业生涯几乎贯穿整个改革开放的年代，时代给了我机会。如今，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了这支队伍，他们又将面临一个怎样的时代？

我们可以“挖向过去”或“守成当下”，而年轻的一代则注定要“一斧头一斧头开辟未来”。

但我坚信所有的挑战都是人类的幸运——在寒冬改变整个生态系统时，总有人会撒下第一把种子，从一点点采摘发展成农业。希望你们是最早播种希望的那批人。

祝福你们，你们一定会拥有比我们更多的幸运和惊喜，用北岛的话说就是——“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时评

汲取团结奋进的力量 从长征精神中

长征所彰显的坚定信念与团结精神，至今仍能为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带来启迪。

1936 年，埃德加·斯诺走进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随后将采访见闻写成《西行漫记》。书中的一段记述让我印象深刻：到达陕北后，斯诺曾询问几位年轻的红军战士是否喜欢红军。这个问题让他们十分惊讶，他们从未想过会有人不喜欢红军。他们解释说，红军教他们读书写字、练习步枪，待他们很好，沿途的农民也常常拿出家中食物欢迎他们。当时，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真实面貌几乎一无所知。斯诺记录下的这些真诚对话，展现了红军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联系，为世界认识中国革命打开了一扇窗。

斯诺在书中这样描述长征：冒险、探索、发现、勇气、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极具感染力的描述，勾勒出长征的艰辛历程。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战士跋山涉水，穿越险峰激流，在重重困难中朝着目标不断前进。其中，强渡大渡河的故事让我惊心动魄：部分红军先在四川安顺场强渡，大部队随后沿河而上，飞夺泸定桥。他们直面激烈的战斗与不断上涨的河水，争分夺秒地竞速前进，最终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成功渡过大渡河。

斯诺之所以将长征誉为“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不仅在于征途的艰险，更在于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凝聚起的磅礴力量。参加长征的将士来自中国各地，说着不同的方言，却为了超越个人利益的共同事业会聚到一起。他们以坚定的意志和高度的奉献精神，在逆境中共同奋斗，最终取得了意义重大的成就。来自不同国家、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能从这段历史中读懂一个道理：当人们真正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便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实现许多看似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这种同心协力的力量，也帮助我理解中国在此后几十年间取得的发展成就。我研究中国已有 30 余年，首次到访中国是在 15 年前。这些年来，中国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公共卫生服务持续优化，高等教育水平显著提升……短短几十年间，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这样的发展成就离不开无数人的默默奉献与共同坚守。

从长征的历史到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团结协作的精神也启发我们思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现实中，人们往往更多关注彼此的差异和面临的挑战。但从我的亲身经历来看，各国人民之间的共同点远多于不同点。当人们坐下来交流对话时，往往能够发现共同关切，增进理解，为合作创造条件。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谊尤为重要。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始终致力于传承斯诺的精神遗产，通过文化、教育和经济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两国人民建立更加深入、持久的联系。美中两国携手合作，能够汇聚更大力量，共同探索全球性挑战的应对之道。

我希望更多人能够阅读《西行漫记》以及其他记录长征的著作和史料，从具体事件和人物经历中感受红军将士的奉献与坚守。这些鲜活的历史细节，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长征、了解中国。历史上，许多国家都有克服困难、战胜逆境的事例，但长征在世界历史上堪称无与伦比。长征所彰显的坚定信念与团结精神，至今仍能为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带来启迪。

（作者为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分校名誉副教授）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希德妮·伍德

AI 进校园，一堂关乎未来的课

近来，不少海外媒体关注到中国“人工智能（AI）进校园”，称中国计划到 2030 年推动近两亿中小学生普遍具备人工智能素养，近半数省市已出台方案，如每年不少于 30 课时、建设 AI 教育示范校等。当看到有 13 岁的学生已借助 AI 开发出 200 多款应用，且思考深入、能独立向投资人阐述创意时，不少海外网友由衷感慨：“中国这些孩子将改变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这份图景无疑让人振奋。一个社会为何能如此丝滑地接纳一项颠覆性新技术，又如何推动它真正融入日常？技术走进生活不是自发的，它既是自上而下、需要承接的成果，也是自下而上、需要顺应的“树苗”。在此过程中，愿意“折腾”的青少年既是上手最快的群体，也是未来规则与秩序的承接者、规范者。他们对新技术的理解，会慢慢沉淀成一代人的共识，反过来塑造技术在社会中的位置与存在方式。因此，AI 素养培育，是一道面向未来的教育命题。其核心不是让学生被动套用工具，而是在使用互动中学会判断、学会选择、学会驾驭，思考希望建立起怎样的人机关系。

“AI 进校园”能快速落地，学校具备的较高公共信任度是重要基础之一。让新技术从“能用”走向“会用”，课堂是一条优先级很高的通道。在其他场景，AI 更多只是作为消费产品、休闲工具存在；而在这里，被纳入课程、项目式学习与赛事的它被赋予了明确目的。这恰恰说明，决定技术走向的是使用的人，是所处社会的制度安排、价值取向。加速布局 AI 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主动布局，把长远发展纳入当下。

但接纳不等于真正融入，融入意味着形成稳定、均衡、可持续的教育生态，在这方面仍有不少有待解答的难题，就比如不少教育学者担心 AI 可能弱化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诚然，当机器可以快速给出答案，教育的立足点在哪里？笔者认为，答案不在模型之中，而在人的成长目标里。人的不可替代性，不在于知识储备的体量，而在于提出问题的能力、核验信息真伪的判断力、在复杂困境中持续探索的韧性，以及共情协作、感知世界的能力。AI 可以辅助，却无法替代使用者拥有这些素养。AI 进校园，是一场技术创新，也是在倒逼教育重新校准重心：从“知道”转向“判断”、从“记住”转向“发问”、从“技能”转向“人格”、从“理解”转向“创新”。

“AI 是帮手，不是思考的替代品。”这句来自前述那位 13 岁少年的感悟，代表青少年中一种健康的人机观念正在萌发：人类为主导，机器做事。这种边界感与其靠一次次宣讲建立，不如在反复实践、试错中慢慢养成。一个社会对待新技术的成熟姿态，也正体现在这里：既不神化、盲目追捧，也不恐惧、排斥隔绝。观念稳定了，位置与关系也就稳定了。

本轮“AI+教育”的推进，凸显了我们面对新兴事物一脉相承的治理思路：实践出真知，也激发了我们对未来社会技术文明的思考。与此同时，底线意识也不能松懈：学生数据安全、注意力保护、人机边界划分……相关规则也还需要同步细化、清晰划定。

中国的新生代，注定要在改变世界的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将以何种方式改变世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今天为他们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一个社会，普及技术不难，但技术文明的成熟需要长期沉淀。AI 进校园，不只是要培养一代会使用人工智能的年轻人，更是在整个社会里，慢慢培育与新技术长久共生的习惯。这种人机相处的成熟文明，是他人真正难以复制的，也是面向长远最宝贵的积累。

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张颐武